

《名人传记》编辑部◎编

《名人传记》珍藏本

历史的 警示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名人传记》珍藏本

历史的 警示

《名人传记》编辑部◎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警示/《名人传记》编辑部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12

(《名人传记》珍藏本)

ISBN 978-7-5559-0286-7

I.①历… II.①名… III.①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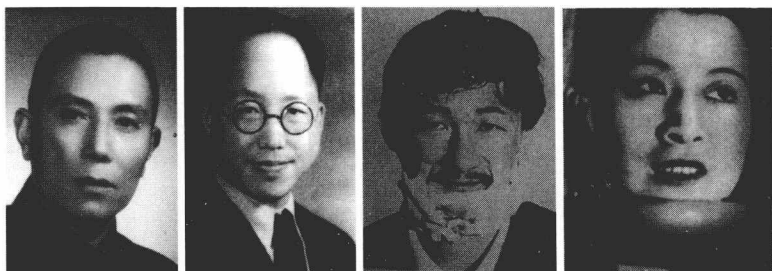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853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2 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本书部分内容选用了国内外资料、图片,因个别作者未联系上,敬请作者与本社联系。联系电话:0371-65384197)



目录 / CONTENTS

- 我采访过的历史风云人物 /001
- 《“四人帮”兴亡》出炉始末 /022
- 与日本电视台谈江青 /039
- 探访华国锋故乡 /058
- 国共密使曹聚仁 /076
- 郑超麟：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 /116
- 我在台湾采访扁家弊案 /136
- 访台湾倒扁领袖——百万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 /162



访章乃器夫人杨美真 /182

罗兆麟：我保存了兄长罗隆基的遗物 /205

三访梁实秋故居 /225

海外华文作家中的四朵金花 /242

姚笛：手持指挥棒的房地产巨商 /265

我采访过的历史风云人物

“逼”上梁山：采访“四人帮”

我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之初，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记录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方式，我最初是被“逼”上梁山的。

记得，在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黑影》正在《羊城晚报》上连载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

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一边做笔记。我发现，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都更震撼！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文革”是一个大题材，受《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启示，我拟定了长卷《“四人帮”兴亡》的写作计划。“四人帮”最初被称为“上海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起家的，我作为上海作家写作《“四人帮”兴亡》占有地利优势。

然而，当我着手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一个美国人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四百八十五吨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的处境大不相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查阅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当时，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文革”档案（仅限于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革”档案，只能吃“闭门羹”。幸好我的写作计划得到上海作家协会党组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使我能够到上海的一些档案部门查阅一部分“文革”档案，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发。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最先查明“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备

受折磨。葛老先生向我指出：所谓“文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你可以发挥作家的优势，走访大批“文革”的当事人，从“活口”那里获得第一手资料。

于是，我拟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登门采访，从许多老干部、老记者、老编辑甚至“四人帮”的骨干、亲友那里，获取了“文革”的重要资料。

比如，关于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的身世，我只在1949年9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的“姚蓬子”条目，查到不足百字的简介。我在北京经过多方打听，最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先生介绍，终于找到姚蓬子的胞妹姚舞雁，得到关于姚蓬子身世的口述历史资料。

又如，关于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以及她进入延安的过程，我在北京找到了重要当事人、王观澜的夫人徐明清，经过多次访问，她向我详陈了一切。

关于江青前夫俞启威（黄敬）的身世，我费了很大周折，在北京找到俞启威的胞妹俞瑾，得到可贵的第一手口述历史资料。

为了弄清“安亭事件”，我除了采访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的韩哲一，还从“安亭事件”的档案中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是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在当时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逐一追访，便可查找到当年的



1992年叶永烈在成都采访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右)

“安亭事件”那些闹事者。当我来到一个已经“退隐”多年、“安亭事件”时某厂造反派负责人家中时，他很惊讶：你怎么会找到我？！

为了弄清王洪文的情况，除了采访他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以及办公室工作人员米士奇之外，我还颇费周折找到当年王洪文的“死对头”——上海“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耿金章所叙述的“二兵团”的兴亡、与王洪文的恩恩怨怨，极有史料价值。

为了获得拘捕江青的第一手资料，我三次飞往成都采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将军。张耀祠将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多年，他回忆了“9·13”事件中的毛泽东。他的口述，同样极富史料价值。

我帮助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芳整理了四十多万字的《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他曾经多年担任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又是审判张春桥组的组长，他丰富的阅历，为口述历史增添了宝贵的一页。

精心选择口述历史对象：陈伯达、郑超麟……

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我所选择的是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

进行口述历史的访问，首先要做好案头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案头的准备，主要是阅读相关的背景资料。在往日，要前往图书馆查阅。如今，在网络时代，借助于搜索引擎可以迅速获取大量相关的背景资料。

对于重点的采访对象,我往往在采访之前,要排好采访对象的年谱。年谱有助于概括和简要了解采访对象的人生历程。我写的江泽民年谱、华国锋年谱、陈云年谱、陈伯达年谱等,都非常详细。

我在采访陈伯达之前,查阅了陈伯达的各种著作,尤其是细读了当年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陈伯达档案。另外,还查阅了二十多卷的《中央首长讲话集》,复印了其中的陈伯达讲话。正因为这样,在采访陈伯达的时候,他说起一些事件,提一下年份,我就能说出哪月哪日。他说起什么会议,我就能报出出席者有谁谁谁。他明白,我是有备而来,确实是他的谈话对手,他就愿意跟我深谈、长谈。

2007年夏天,我在美国洛杉矶遇见从法国巴黎来的林希翎,跟我出席同一个会议、住在同一家宾馆。林希翎是当时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我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采访机会,立即抓紧时间采访。1957年,我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林希翎的大名。后来,我在《反右派始末》一书中,也详细写及她。很巧,我俩又是同乡,在美国采访时用温州话交谈,感到非常亲切。这样,采访就能谈到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她当时跟胡耀邦秘书之间的恋爱关系,她是怎样看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她与她在台湾的父亲的关系等。

另外,在采访的时候,只要是历史的重要当事人,不论是否遭到“冷遇”,都要尽量寻访。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克全(凯丰),由于他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从此被“冷落”,关于他的生平鲜为人知。我在江西南昌得知何克全长女的地址后,就

克服困难去寻访,终于找到了她,得以畅谈何克全的生平。同样,我寻访有着可怕名声的“托派领袖”郑超麟先生的时候,也是事先向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部门“挂”了“号”、备了案。郑超麟是陈独秀的机要秘书,“八七会议”出席者,也是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留学法国时与邓小平同住在一个房间……然而,在国民党的眼里他是共产党,在共产党眼里他是反革命(托派),他被国民党关了七年,被共产党关了二十七年。我一次次采访他,他的口述涉及中共早期党史的诸多重要问题。我也寻访曾经被毛泽东称为“党内机会主义头子”而遭到冷落的罗章龙,收获颇丰。

为了寻找形形色色的口述历史者,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放弃任何有价值的采访线索。我在上海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查阅报刊时,一位姓姚的管理员告诉我梁实秋刚去世,台湾报纸这几天整版刊登纪念文章,我当即复印了这些纪念文章,从中得知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在北京,梁实秋的夫人韩菁清在台北。据此,我到北京采访梁文茜,并趁韩菁清来沪时多次对她进行采访,终于写出关于梁实秋的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听说最早的红卫兵领袖骆小海在硅谷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便去采访,他口述了清华中学红卫兵的起源,他最早提出“红卫兵”这一名称的历史背景等,成为研究红卫兵史的重要口述资料;当我得知王福时老先生住在旧金山一家老人公寓,便乘地铁赶去采访,他口述了当年如何担任美国记者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翻译,陪同她以及俞启威(即黄敬,江青的前夫)进入延安,他还多次陪同斯诺夫人访问毛泽东……

美国总统下台后,头一件事就是从事回忆录的写作。就连赫



叶永烈采访毛泽东儿媳刘松林(左)

鲁晓夫下台后,也口授了回忆录。遗憾的是,中国当代的重要政治家,不论毛泽东、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没有留下回忆录。

令我扼腕叹息的是,我失去了三次重要的采访机会:

第一是采访江青的机会。我一直准备采访她。我深知,依照江青的性格,一旦我能够直接采访她本人,她会滔滔不绝地什么都谈。当江青被囚禁在秦城监狱的时候,我知道很难有机会到那戒备森严的地方采访她。后来,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获知江青因病住进北京复兴医院,复兴医院是公安部所属的医院,正住在公安部招待所的我,当即请公安部的朋友帮助联系,希望能够跟随公安部的车子前往复兴医院探望江青。我是以研究“文革”史的名义申请的。在公安部朋友的帮助下,获准采访。就在我准备搭公安部的车子前往复兴医院的时候,对方在电话中问了一句:“你会不会写成文章报道?”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就因为这句“当然”,对方犹豫了,说要请示一下。这一请示,我就失去了这一难得的机会!

第二是采访华国锋的机会。2008年8月20日下午,香港《凤凰周刊》的记者来电,告知我华国锋刚刚去世的消息,并要求我谈谈华国锋的生平。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永远失去了直接采访华国锋的机会。华国锋自从退下政坛之后,有的是空余时间,是极好的采访对象。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角,我很想听听华国锋口述粉碎“四人帮”的决策经过。从1991年5月我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之后,便与华国锋的秘书曹秘书、于秘书多次联系,希望能采访华国锋。我还到了北京华国锋的住处,把我所写的《华国锋年谱》请秘书转交华国锋。可是,华国锋却一直坚持说,采访

他必须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批准。这样,我一次次致电华国锋的秘书,未能获得华国锋的同意。直至2006年5月12日,我在北京还与华国锋的秘书曹秘书通了电话。曹秘书告知我,采访华国锋,必须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批准,这是中央的规定。就这样,华国锋在晚年没有接受我的采访,也没有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第三是采访张玉凤的机会。她是一位相当重要的历史当事人。1990年10月24日,我在北京详细采访了为毛泽东侍读诗词的芦荻教授,她当时就应我的要求,给张玉凤打电话,向张玉凤介绍了我。然后,她把电话交给我,张玉凤在电话里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可是,那几天张玉凤正忙于女儿出国之事,无法接待我,而我又已经买好两天后回上海的机票。就这样,我与张玉凤擦肩而过。此后,由于有关部门对于采访张玉凤作了规定,使得这一采访遗憾地中止了。

沟通的技巧:与施明德、陈伯达

口述历史的采访,需要注意提问的技巧以及谈话的切入点。

2007年年底,我应邀作为“观选团”成员从美国飞往台湾,在台湾政坛进行诸多采访。由于我对于台湾政坛一向很关注,熟悉台湾的政治板块,因而在采访施明德的时候,我首先问他,那个大拇指朝下的倒扁手势,是谁“发明”的?他大笑着说,“发明权”属于他。我又问,在百万红衫军倒扁时,天降大雨,百万民众岿然不动,你在雨中突然跪下,向百万民众致谢,这个动作是事先的设计,还是临时想起的?他回答说,那是不由自主……由于对施明

德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那天下午在施明德家里的采访相当顺利。

在台湾,我声称我“非蓝非绿非红”,以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采访,不仅采访了蓝营的政治人物蒋孝严等人,而且采访了诸多绿营人物(内中包括深绿人物),诸如民进党中央秘书长李应元,“行政院”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副主委童振源,陈水扁的爱将、“立法委员”罗文嘉,甚至在台联党总部采访了李登辉的发言人周美里。我认为,只有这样不分“颜色”、全面采访,才能真实地写出台湾五光十色的政治舞台。

我是陈伯达晚年的唯一采访者。采访陈伯达的困难在于两方面:一是必须获得公安部的支持;二是必须得到陈伯达的同意。

我从公安部获悉,陈伯达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满——他是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他的十八年刑期便从那一天算起。陈伯达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里为他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十天之后,我便从上海赶到北京,开始对陈伯达进行采访。我能够在上海得知陈伯达的情况,并且如此及时赶去采访陈伯达,得益于公安部的帮助。

当时,采访最大的困难在陈伯达本身。陈伯达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会触及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时,他很明确地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陈伯达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话极为蹩脚,一般人难以听懂。

我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在北京,我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陈伯达的子女、老同事、警卫员等人。待我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后,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我在打“外围战”时,就被陈伯达知道了。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还写什么“传”?!他说:“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免了吧,我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虽然他的老朋友把他的话转告了我,但是我仍要求跟他见面。我想,我还是能够劝他接受采访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些追求奇闻轶事的小报记者,我是把对于“文革”史的采访作为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来做的。陈伯达是“文革”中的重要人物(前三号人物),因此,对于陈伯达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考虑到陈伯达已是风烛残年,对他的采访,当是刻不容缓了。

在打了“外围战”之后,我有了充分的把握,于是,我决定去采访陈伯达。当然,我深知,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访,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就连对他的称呼,我也做了反复斟酌,考虑再三,觉得还是“陈老”最为妥帖,一则他确实“老”,二则这是中国人对年长者的习惯称呼,亲切之中包含着尊敬之意。

在我看来,陈伯达有着双重身份:他是历史的罪人,我在写及“文革”时以批判的目光对待他;他又是历史的当事人,是我的采访对象,我要尊重他。陈伯达已经刑满,住在北京偏远的一幢楼房的顶层。那一层一共两家,另一家住的是公安人员。陈伯达跟